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新发展阶段“变”与“不变”

新思想：标识性原创性概念

新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既延续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规定，又回应时代条件的深刻变迁

■汤蕴懿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一论断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紧密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蕴含着对过往历程的深刻洞察、对

现实国情的精准把握、对未来蓝图的清晰擘画。

新发展阶段的“变”与“不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和时代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大潮相结合。新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既延续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规定，又回应时代条件的深刻变迁。

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变”与“不变”。毛泽东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邓小平同志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阶梯式递进”的动态过程。可见，新发展阶段并未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范畴，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当前，我们正处于这一长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根本任务仍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一步彰显从“量变积累”到“质的飞跃”的阶段性特征。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在新起点上的阶段”，

核心任务从“解决温饱”“全面小康”升华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与“不变”。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又通过改革释放生产力活力的辩证统一，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基本规律，又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活力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制度保障。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每一次改革都是对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新时代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三是人民主体地位与发展目标的“变”与“不变”。从“满足物质文化需要”到“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人民利益始终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贯穿各个阶段，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优越性。在新发展阶段，我们不仅追求经济规模增长，更聚焦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

的内涵。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站在“十四五”规划收官与“十五五”规划谋划的关键节点上，我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发挥上海超大城市独特发展优势，加快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发展新路径——

超大城市凭借资源集聚、辐射力强等独特优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上海的前期实践表明，处于新发展阶段的超大城市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和功能提升、从单一政策优惠转向制度创新、从人口集聚转向价值共享，可以形成生产力跃升、生产关系优化和发展成果共享的独特发展路径，进而形成治理高效、创新赋能、生态宜居的协同发展格局。

新时代新征程，上海应聚焦“五个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总体定位，进一步发挥超大城市先发优势与集聚功能，乘势而上、全面发力，转型升级，攻坚克难，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比如，打造新质生产力策源新高地。以全球科创中心建设为引领，提升全球高端要素集聚与原创技术策源的核心能力。锚定科技自立自强，前瞻布局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融合，打通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化应用路径，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高能级企业集聚发展的良好生态。

又如，构建制度型开放新标杆。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以自贸试验区为载体打造内外循环枢纽，形成金融开放、数字贸易等领域可复制经验，并筑牢开放风险防控屏障，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同时，自觉从落实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出发，统筹做好制度创新、功能培育、资源配置、服务保障的大文章，全力打造新时代国际开放枢纽门户新标杆，更好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

再如，形成超大城市共同富裕新范式。构建普惠共享、精准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完善社会保障与就业促进机制以缩小发展差距；健全三次分配协同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依托数字化治理提升精细化水平，兼顾数字公平与能力提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福祉改善的动态平衡。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徐光寿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精神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全民族抗战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精神形成——

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是大团结精神的根本成因。日本军国主义以掠夺为目的，侵略邻邦，涂炭生灵，严重违背政治道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站在法律与道义制高点，决定了战争的正义性。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等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华民族呈现大联合面貌、展现大团结精神。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大团结精神的文化底蘊。全面侵华战争伊始，日本曾发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凝聚起各民族各阶层的抗日热情，使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成为伟大的人民战争。“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是无数中华儿女为抗日救亡舍家纾难的真实写照。中华民族以大团结的万钧之力，铸造了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贞不拔的必胜信念为内涵的伟大抗战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大团结精神形成的政治保障。在14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上审时度势，不仅及时、有力地高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旗，还科学分析、正确把握战争形势，全面论证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体现了鲜明的前瞻性。面对全面抗战的复杂形势，中共坚定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体现了鲜明的进步性。同时，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创造加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的好形式、好方法，加强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体现了鲜明的先进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顽强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开辟了世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抗日战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更加空前团结，一寸山河一寸血，“四万万人齐蹈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共同抗击，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新四军贯彻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战略方针，进入大江南开展抗日斗争。同时，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依托东江、琼崖等根据地，在战略上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和太平洋盟军；西南地区各族儿女为输送抗战物资，共同修建滇缅公路，扩建与新建大量机场，积极参军拥军，英勇无畏主动作为。可以说，中华民族大团结精神呈现于多元的抗战群体中，贯穿于全面抗战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域。

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一，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发挥党引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主心骨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顺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世界大势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潮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伟大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中华民族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最大底气，是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二，巩固新时代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开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新局面。历史证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当年中华民族大团结精神的凝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战胜利提供根本保证。新时代新征程，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第三，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新时代新征程，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将之作为了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矢志不渝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汇聚各民族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强大合力，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华民族以团结一心、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迈向美好未来。

（作者为高校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中心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

民主知识体系自主性表达

■赵成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一个重点是深刻阐明其“理论的彻底性”和“实践的指导力”。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大背景下，以“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方法论，既能够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解釋力和实效性，也有助于引领推动中国政治文明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发展。

一方面，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同时，也体现出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

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保持张力与弹性，具有可塑性、包容性、共享性。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本身就充盈着时代的张力，蕴含着关于民主的形式、结构、本质与价值等丰富的内容。以“全过程”对民主进行界定和概括，不仅提炼性地弥补了存在的空洞、模糊的缺陷，还提升了定义的科学性；既保留民主的基本元素，兼容一些特质与内涵，又能够对民主发展提供可借鉴性和启发性，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同时，也体现出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既推动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又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特别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观超越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民主观，使民主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坚持以“全过程”民主超越西式民主主体投票民主和形式民主，把民主的形式与实质真正统一起来；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超越西方多党政治精英博弈的民主体系；坚持以治理型民主超越西方选贤型民主，着力克服治理失效、国家失能弊端；通过构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践模型，实现民主概念从空间维度到时间维度的创造性拓展。

另一方面，以“两创”方式促进中国政治文明话语体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又汲取西方民主文明的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汇聚成一股独特的民主力量。从知识生产维度看，它既避免了民主话语的“概念通胀”困境，又创造了新型政治文明的“中国版本”。

一是坚持以民主内生性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不断结构化。全

过程人民民主各要素具备显著的内生性驱动力，包括使命驱动、战略柔性与文化基因能力，体现出创新领先、治理效能与可持续发展的外化表征。这一内生性要素和外化表征合力展现出更开阔的视野、更充足的动力、更高效的运行机制、更强的生命力与更持久的韧性，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不断结构化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坚持以民主的主体性与自觉性，推动人类民主知识多样化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实践中，通过自主性的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宣传教育、民主选举等，为人民群众提供民主参与平台，逐步塑造与提升了民主主体意识、民主自觉意识。这一实践对全球民主知识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中心”和“边缘”关系提出了重构冲击，有望推动人类民主知识的多样化发展。

三是培育民主内生性发展机制，实现传统民本理念的现代化转换。民主的内生性特点与一个国家的思想传统、社会环境、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存在密切关联。不深入了解民主的内生性特质，就无法理解民主模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作为中华民族追求民主精神的独特标识，是中国式民主内生性发展的思想资源。例如，从“民惟邦本”到

“人民至上”的语义转换，赋予传统政治伦理以新的时代内涵；通过提取“水舟之喻”“天下为公”等文化基因，将其转化为“人民主体地位”的现代政治表达，完成民主理念的本土化编码。

四是坚持以自主知识再生产能力，不断获取发展优势与竞争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与价值观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而非外部引入或强加，是自主知识再生产能力的生动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民主制度结构、民主议题设置、民主话语表达等构建出一套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体现出一种动态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具有开放性、拓展性与迭代性等特征，既能够随环境变化不断整合、重新配置与更新内外部资源，系统创造与调整运行机制，又能够以优异的吸收能力、整合能力与创新能力，促进其在全球民主概念、制度与模式的博弈与交流中不断获取发展优势与竞争优势。

五是提升民主知识体系构建能力，促进中国政治文明话语体系自主性发展。民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包含多维要素的复合体。提升民主知识体系构建能力，一个前提是对民主的基本理念、价值立场要有清晰的认知和明确的表达。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价值

引领，以“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为逻辑链条，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制度安排，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完成了民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表达。

进一步看，实现从政治实践到理论范式的跃迁，重要的是从“历史深处”把握民主的概念化和再概念化演进，从“现实历史”出发审视和丰富民主的概念化和再概念化的现实张力及未来趋势。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两创”为方法论，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并在“程序正义—实质民主”的辩证统一中，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方案。这不仅关乎中国式民主的成熟定型，更是对所谓“历史终结论”的有力回应。

（作者为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教授）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创新城市治理理念模式手段

■薛泽林

日前，上海市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推进大会举行，强调要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不断推进城市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和城市服务的精细化精准化。

坚持人民至上

治理理念创新的关键在于，既要国家现代化城市体系建设大格局下系统思考和深入谋划城市功能的实现，又要调和不同群体的差异化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人民至上，将不同行动主体和利益相关者纳入公共决策之中，真正落实“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截至2024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983.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近40%，对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治理运作机制、参与监督反馈、法治规则保障、社会组织动员，成为创新城市治

理理念、提高城市治理效能的基本路径。

实践中，超大城市的开发建设处于从空间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的关键时期，传统依赖人力投入和简单运用技术手段的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匹配超大城市形态结构演变内在的要求。如何聚焦基层群众感知，在“人本城市与效率城市”的平衡间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水平，是整合资源、聚合力量、激发活力、培育共同体意识、实施共同治理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场景。

完善治理闭环

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人口结构的特殊性是上海在设计治理制度时的重要考量。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截至2024年，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77.62万人，占总人口的37.6%，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是人口和居住多样化。包括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在内的

新就业群体，长租、短租、共享居住等新居住空间，以及大居型、园区型、国际型等多类型社区、生活生产场景多样并存，造成公共服务需求、多元利益诉求、矛盾问题更复杂，城市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难度。

在基本完成资源下沉、力量下沉的情况下，聚焦提升面向216个街镇乡、1.3万个住宅小区的基层治理效能，以高效能治理助力高质量发展、赋能高品质生活，实现城市发展和治理改善良性循环，是上海城市治理模式创新的必然选择。

从城市治理的迫切性看，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需深入聚焦“小切口”治理载体和有效抓手。物业治理、环境卫生、公共服务供给、公共设施维护等看似琐碎的日常问题，恰恰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核心因素。城市治理的成效，不仅体现在宏大的发展规划中，更体现在这些细微之处的改善上。

今年9月，上海无卫生设施旧住

房提升改造总体完成改造任务。这场历经30余年的旧改实践体现了对民生“小切口”的关注。

实践证明，通过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将治理重心下沉到街道、社区，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才更能构建起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实现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与人性化统一。

强化技术支撑

随着数字技术应用对城市治理“最后一米”的赋能，城市治理事实上进入一个更加“原子化”的精细时代。要通过城市硬件的精细化管理、基层事务的精细化治理、技术应用的精细化推进，将城市的品牌价值转换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而形成治理良性循环。

近年来，上海紧扣精细化管理和精细化服务两个关键，在做好管理的基础之上持续优化服务。一方面，强化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围绕超大城

市高水平安全体系建设和总体形象提升，完善“市—区—街镇”三级精细化管理标准，不断开发智能化工具和应用场景，不断创新城市综合执法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强化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鼓励区、街镇、居村、小区不同层面的管理单元，针对自身特色情况探索差异化的管理方法，在和谐有序的差异中彰显城市整体秩序，让人民群众更多地感受到城市的安全。

特别是，通过智能化技术方法支撑、协商式制度机制建设，精准识别人民群众的差异化公共服务诉求，进而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城市治理创新中的应用，通过完善人人参与机制唤醒使命感、加强主动性，构建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解·析